

W. 1045

14

会通文史资料

第六辑

88



國立
台灣大學

H105/23

合浦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合浦县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封面题字：韩焱周

封面设计：黄业元

合浦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浦县委员会办公室编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30日

目 录

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所经过的坎坷历程…岑麒祥	(1)
语言教育家岑麒祥	时 生 (17)
清末、民国年间合浦商场简况	邓敦衍 (22)
抗日战争期间合浦田粮机构概况	黄 柱 (28)
民国年间合浦中、小学校情况	黄 柱 (34)
民国年间的廉州书店	王垂远 (44)
还珠戏院今昔	韩美周 (47)
合浦宾兴馆和珠藏书院	韩美周 (56)
日寇首犯北海采访琐忆	龙起翔 (59)
抗日战争期间廉州防空及敌机狂炸见闻忆述…文史组	(60)
日寇溃退过境见闻……王冠超、周简、陈辉、吴步云	(65)
我所知道的邓世增	李汝祥 (70)
合浦籍名人录	(75)
牛巴佬炸县长	周 简 (81)
征稿	编辑组 (83)

我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 所经过的坎坷历程

岑 麒 祥

一、小 引

近些年来，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要为我国的语言学家编写小传，跟我有关的，在并不很长的期间，就为我写了好几篇：（一）时生写的《语言教育家岑麒祥》，刊登杭州大学出版的《语文战线》，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二）由刘月华执笔的《岑麒祥》，载北京语言学院主编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分册，一九八一年出版；（三）邵斌用世界语写的《Vizito al Esperanto Cen Qixiang》（世界语语言学家岑麒祥访问记）载北京出版的《El popolo la Ĉinio》（中国导报）1982年4期。此外还有一两篇在香港编写的，我只收到一些复印得比较模糊的材料，还弄不清楚有关刊物的名称。这些论文的内容多大同小异，只是编写的方式略有不同。接着，还有外省的一两家杂志约我写自传。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北京语言学会某同志约我写一篇有关我的专业文章。我对他说：“不是有人写过了吗？”他说：“不然。您在我国语言学界泡了几十年，其中酸甜苦辣各种味道，比许多人都更

清楚。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能把平生的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但对您有好处，对大家也很有参考价值。何乐而不为呢？”我听了似乎也很有道理，于是接受了他的邀请。拟分以下几节来写。

二、准备阶段

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没有语言固然无从产生语言学，光懂得一些语言或方言也不能说已经成了语言学家。我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我怎样从小就学会了一些语言和方言，但实际上只是为我以后学习语言学作好了一些准备。

我 1903 年生于广东省合浦县（现已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附城的一个穷苦的读书人的家庭，从小就习得了城关一带所使用的廉州话（属粤方言系统）。小学毕业后升中学（旧制的，四年毕业）。有些教师是从广州聘请来的，他们不会讲廉州话，我又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广州话。中学从第一年级开始教英语，直到毕业又学习了四年英语。那时，从小学起，各种课本都已改用白话文编写。白话文其实就是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只有读音要按照廉州话或广州话的发音念，所有词汇和语法都是普通话的，而不是廉州话或广州话的。可见我自脱离婴孩时期以后，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已经学过了好几种语言和方言。

我 1921 年在廉州中学毕业，找不到事情做，每天呆在家里，日子很不好过。有一天，偶然看报纸，知道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招收英语科学生。全学程共分四个年级，有一定程度的可以随时插入相当班级。全部课程学完后，经

审查合格的发毕业证书。我看后，心里想：这对我不是很合适的吗？我在中学的最后两年，对学习英语特别感兴趣。现在乘这机会往上面多加一点油，如果学业确有进展，不说别的，就在家搞些翻译工作也是可以的呀。想定了，就按规定把应交的学杂费等如数汇寄该校办事处，报名加入三年级学习。不多几时，果然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学生证以及讲义、抄录练习的课卷等等。我居然成了他们的一个正式的函授生。

函授学校的课程是分四个年级的。我在家里用全部时间去学习，只消半年就把三年级的课程学完了。看看效果还不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周刊》已勉强可以看懂，有些不太专门的英语读物查查词典也可以翻译。于是再汇钱去继续读四年级的课程，也只用半年的工夫就全部读完了。他们并且给我寄来了一张印得很漂亮的毕业证书。

函授学校学完了，可是在我们穷乡僻壤的家乡能干些什么呢？有一天，我正在纳闷，我的一位堂兄弟跑来告诉我，他准备到广州去考学校，问我去不去。我感叹地说：“哪来的钱啊！”他继续对我说：“听说广州有一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是全部公费的。读书不要钱。可是从合浦到广州去的路费当然要自己筹措。”我听了这话，心里动了一动，赶快去跟母亲和姑母商量。我的姑母一口气答应借给我一百块小洋，并向我说了一翻勉励的话。那天晚上一直睡得很不好。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终于和几个伙伴决定取道北海乘海轮到香港然后转赴广州。想不到船刚到香港，由于时局关系，由香港到广州的水陆交通全部被截断了。人心惶惶，进退两难。有些人主张先返家乡，等时局平静了再来。我坚持

要等下去。幸好过不了几天，省港交通就恢复了。我赶紧动程前赴广州，搬进一间会馆里关起门来温习功课，经过初试、复试，居然名列前茅考上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结束了我准备的第一个阶段。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是我国当时五间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内分文史、英语、数理化、博物四部和一个图工科，全部公费待遇，四年毕业。由于地处南陲，交通不便，规模比较小，但它究竟是全省唯一的一间国立高等学校，并且全部公费待遇，学生挑选得比较严，师资也比较出色，所以还是全省的一间办理得比较完善的高等学校。1924年，国共合作，除开办黄埔军校以外，并将广东高师和法专、农专等校合并为广东大学，原广东高师改称广东大学高师部，仍保存原有体制；1926年广东大学改称中山大学，原广东大学高师部又改称中山大学高师部。那时正是我国大革命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广州的地位也日益高涨，在一定期间广州俨然成了全国文化中心，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郁达夫、鲁迅、顾颉刚、傅斯年、刘奇峰等等也纷纷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我本来是以学习外语为专业的，但因特别重视翻译工作，对好些名作家的教诲也毫不放松。那时广州、香港以至上海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时常看见登出我的作品和翻译文章。

教于1926年夏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已读了两年，按规程已属毕业之期，许多同班和同届的同学都已纷纷离校奔赴各处就业，忽消息传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要把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今后师资和设备将更为宏厚。有些同学很希望能继续下去，派代表去跟学校当局磋商，决定因为高师部的

学生都是旧制中学毕业的，又没有念过预科，要进大学，可以增设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来容纳他们，但不能再享受公费待遇。大家都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合理的，我于是决定再多念两年大学。在这两年间，除了法语以外，我还多读了一门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其他课程都是更高一级的，毕业时由大学授予文科学士学位。

三、留学法国

1928年我在中山大学毕业，并由学校授予文科学士学位。我暗自揣度，今后恐怕要和学生生活告别了。想不到过不了多久，有一位朋友来告诉我，中法协会今年还是象上年一样要在广州招考公费留法学生，问我去不去。我心里想，既然有这个机会有，不妨去碰碰运气，因此按照规定的报名时间报了个名，并参加考试，最后才知道在九个人当中只录取了我一个，想不去也要去了。我赶紧去找我的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征求他们的意见。据说：“学校正在筹备设立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的人还找不到。目前，法国的语言学是很有名的，你去学习语言学不是很合适的吗？”我听完他们这样说再也不敢说什么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终于那年八月中旬和几个伙伴在香港登上法国的邮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一个月，于九月中旬抵达法国极南的商埠马赛，改乘火车于当天傍晚到了中法协会所在地里昂，暂时住在中法大学宿舍。

休息了两三天，中法协会秘书长顾朗（M. Courant）教授约我去谈话。他曾担任过法国驻华公使，能说上一口相当

漂亮的汉语普通话。我把我的履历和我的老师对我的期望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沉吟了一会对我说，现在法国大学对像我这样的留学生有两种学位：一种是大学博士学位，只要对法语有一定的认识能力，找一位大学教授和他商量好一个研究题目，在他的指导下写出一本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经答辩认可后就可以获得。这样论文的范围比较狭窄，只能适用于外国留学生，本国学生不能采用。另一种是国家硕士学位。要取得这种学位必须通过笔试和面试取得一定数目的高等研究证书（文科四张，理科三张）。每张证书指定国内外有关的名著让学生自己研读，教师只讲其中有关键性或他自己认为有独到见解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是不印发讲义的，你听不懂，做不好笔记，那只好自叹运气。一般来说，准备一张证书大概需要一年，四张证书就需要花上四年。至于国家博士学位，那是更高一级的学衔，须要提出两本论文：一本是用法文写的，要求有很高的世界水平，另一本是用拉丁文或外文写的，作为第一本论文的剧本。准备国家博士学位没有规定的课程和年限。有些人在取得国家硕士学位之后再考取一张或两张高等研究文凭获得在大学教书的资格，就一面教书，一面准备国家博士学位，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提出申请举行答辩会。国家博士学位答辩会往往是布置得非常辉煌严肃的。

顾朗秘书长这样向我介绍法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做法使我明白了他们的各种措施都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应该怎样去接受他们对我的教导呢？还不很清楚。他好象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情，于是继续对我说：法国没有私立的大学，全国十三间综合大学都是国立的，所开设

的基本课程也都是相同的。比方每间大学的文科都分哲学、历史、古典语言文学和现代语言文学等几个大系，每个大系又分若干小组，都是全国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每间大学又可能各有它的一些特点。例如离这里里昂不远的格勒诺布尔，因为那里的风景秀丽，每年前去旅游的外国人很多，大家都想顺便学些法语，那边的大学为了适应他们的这种要求，特别训练了一批很有本领的语文教师去担任教学，成绩卓著，年复一年，竟成了该大学的一个固定的附属机构。全国最完备的是巴黎大学。它的文学院（Sorbonne）的基本课程跟其他大学的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除此之外，它有许多研究所，如语言学研究所、语音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等等却不是其他大学所有的。停了一会，他明白告诉我，要学习语言学，里昂并非理想的地方，最好先到格勒诺布尔补习一下法语，那边没有什么中国人，对听、讲的训练都很有利，补习后回里昂学习一些一般的课程，最后到巴黎去学习一些深造的课程。这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不过这牵涉到经费开支的问题。在里昂有现成的宿舍，宿舍里有公共食堂，费用比较低廉，到别处要多花一倍以上的费用，这可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要开会讨论。他最后叫我放心，他一定设法为我解决困难。顾朗教授这种诚恳负责的态度令我非常感激。过几天后，我果然接到他给我的一个书面通知，同意我分三个阶段学习的计划。过了两天，我就动程到格勒诺布尔去了。

格勒诺布尔是在里昂东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坐火车二小时可以到达。全城建筑整洁华丽，北部伊塞尔河畔一带，风景秀丽，是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当地大学附设的法语专

修科分小班、中班和师范班进行教学。小班五六人，中班也不过十来个人，师范班却多达一百至一百多人。小班从字母教起，自编讲义，采用一种新方法进行教学，不管学习时间长短，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跳到中班去，中班的情况也是一样，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跳到师范班去。其所以叫做师范班是因为这一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各国的法语教师以至大学教授前来作短期进修的。我在国内虽然作为第二外国语学习过两年法语，但只限于阅读一些书面语言，听、讲、写的能力都很差。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格勒诺布尔大学和法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对学生都是只管教，而不管住宿和伙食的。食宿的问题只好由每个人自己设法解决。我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租一个房间住，食在一个家庭饭馆包伙。一早起来，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免不了要和法语打交道，所以进步得特别快。我在法语专修科小班只读了一个星期就把我调到中班去，中班的教材当然比较高深，我也只读了约半年就被调到师范班去了。师范班除语文教材和作文、翻译等练习外还经常约请一些知名人士来利用幻灯等设备向学员作一些有关法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报告。大家都觉得很受教益。

补习法语完毕后回到里昂。情况可与上次来时完全不同了。上次初来时，象聋子，人家说话一点也听不懂，我说的法语人家也很难听懂。这一回却可以随便交谈，没有什么障碍了。可是里昂大学没有单开的语言学课程，我学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只好按照顾朗教授给我的指示，在文学院现代语言文学大系中上些与英、德、法语有关的课程，而集中在考取“英国语文学”和“实际研究”这两张高等研究证书。

关于英语的知识，我在国内已经有相当宏厚的基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英语史”和“英法法英翻译”两方面就可以了。第一年考取“英国语文学”高等研究证书不算很费力气。第二张高等研究证书“实际研究”注意在实际研究工作。如果有条件，我本来可以到英国去住上三几个月进行直接观察。但是因为条件没有，只好留在里昂在有关教师的指示下从事一些实际研究的工作。一年中我做的主要是从英国出版的图书杂志中找材料为当代欧美著名作家用英文或法文写些有关的传记或轶事。有些我还把它译成汉文寄回国内发表，最后于1938年编成《欧美现代作家自述》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从前在国内虽然已经学过两年德语，这次作为第二外语也在这个时候在此通过了。

1931年秋，我又从里昂大学转学到了巴黎大学。法国各大学对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是可以相通的，转学并不需要办理什么特别手续，只把我的档案从里昂大学的注册部转移到巴黎大学的注册部就行了。

巴黎是法国的首善之区，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一切都莫不以它为中心。繁荣昌盛，世界知名。就我所学的专业来说，除文学院的基本课程与其他大学的相同以外，如语言学研究所、语音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等都不是其他大学所具备的。法兰西学院虽非普通教学的场所，可是著名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所担任的比较语言学讲座和著名实验语音学创始人斯洛（P. Rousselot）所遗留下来的“语音实验室”都设置在这里。至于图书仪器的丰富充实，教授的优良品质，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了。

我到巴黎的最大愿望是想尽可能学完它所开办的各种深

造课程，主要计有房德里耶斯（J. Vendryes）主讲的语言学、傅舍（P. Fouché）主讲的语音学、柯恩（M. Cohen）主讲的语言调查和梅耶主讲的比较语言学，集中在要考取语言学和语音学两张高等研究证书和一张语音学高等研究文凭。这样就可获得国家硕士学位和一张高等研究文凭，一切需要面授和参加考试的课程都已囊括其中了。

傅舍主讲的语音学在文学院语音学研究所上课。它是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语音学研究所并驾齐驱的全世界设备最完整的语音学教学研究中心。我国刘复曾在这里在法国著名语音学家博瓦洛（Poirot）的指导下通过他的博士论文《四声实验录》。博瓦洛逝世后，法国政府本来要把格拉蒙（M. Grmmonet）从蒙贝里耶调来承乏他的遗缺。格拉蒙因年老体弱，不愿离开他的家乡，特推荐他的得意门生傅舍来担任所长。傅舍年富力强，办事很得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全所的教学工作搞得蒸蒸日上，井井有条。我把头一年的时间全部用来听他主讲的“高等语音学”和仔细研读他所指定的各种参考文献，一点也不敢苟假。他特别重视语音的实验工作，专门委托他的助手杜朗女士（M. Durand）教我们制造假腭和操纵浪纹计等仪器。他时常抽空来检查我们的学习，非学到能够自己安装和利用不可。为了学好这一套本领，我还到民族研究所去旁听柯恩教授主讲的“语言调查”课，利用所学到的方法整理出我国汉语广州方言的语音系统作为实习的对象，于一年零三个月期间，除经过笔试和口试考得了语音学高等研究证书，并以《中国广州方言发音实验录》为论文的语音学高等研究文凭。这篇附有许多图表的论文后来由顾朗教授介绍刊登于1934年的《中法年鉴》。

我到巴黎后另一张要考取的是语言学高等研究证书。主讲教授是巴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语言研究所所长房德理耶斯，上课地点是在法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师范学校，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除房德里耶斯本人的《语言》以外，还包括瑞士索绪尔（F. de Saussure）、丹麦叶斯泊森（O. Jespersen）以及美国萨丕尔（E. Sapir）和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等著名语言学家的各种大部头著作，我自己还要到法兰西学院去听梅耶的比较语言学课。范围广、问题多，大家都认为是一张难度很大的证书。可是我自己想，我这次到法国来就是为了拿这一张证书。这一张证书拿不到岂不等于虚此一行？所以在最后这一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考获这一张证书上面。有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似乎还没有吃透，六月份那场考试始终不敢提出申请去考。暑假时还不断温习，直到十一月才决定去考，一次就通过了。主考人因为知道我是中国人，口试时还特别邀请著名汉学家卜罗克来提问了一些与汉语方言有关的问题，结果都被我答对了。

我在法国学习了这么几年，凡他们所开设的有关语言学的课程都已学完了，而且给了我一个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外加一张语言学高等研究文凭。按理说，可以在那里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国家博士学位。可是据说，因为我是外国人，这些问题按当时规定很不好解决。“那是否可以在国外解决呢？”我随便向有关大员问一句。“看来可以”他回答，“准备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没有规定开设什么课程，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论文写好后，定期举行答辩会就行了。但是答辩会一定要在本国举行”。我听了，那似乎不是什么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且容以后再去解决好了。于是决定于那年

冬季沿着来时的道路离法返国，在茫茫大海上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年，于翌年春初经过香港回到了广州。

四、初出茅庐，试图腾飞

广州是我的旧游地，中山大学是我多年的母校，一切虽然没有什么大改变，可是我从前熟悉的几位教授都已离校到南京或上海任职。好些相识的旧友恳切把我留下来担任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三门课。因为那是1933年度的下学期，先开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两门留待下学年与语言学同时开出。我只好暂且答应了。

1934年度开始，我被委任兼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和《语文学专刊》（季刊）主编。幸好在前半年间，我前三种讲义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方法都已基本上完成，只略加补充修改就可以拿去铅印。为了充实《语文学专刊》的内容，我并且把法国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译成汉文先后刊登于该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四期合刊。此外，为了便利于修习语音学和方言调查的同学学习辨音和标音起见还撰写了一本《国际音标用法说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之后，我把语音学讲义改写成《语音学概论》一文交中华书局出版，也颇引起读者的注意。接着，如1934年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的《音节论》一文也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

1936年，南京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招考留英学生，我被聘请为考选委员之一。趁大家集中在南京阅卷之便和前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开会讨论如何分区进行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计划。我被推选为华南地区的负责人。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答应极力予以协助。我返中山大学后即开始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一方面尽量鼓吹应届毕业生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写毕业论文，另一方面把我的方言调查的讲义改写成一种倡议书在《语言文学专刊》上发表，争取校外人士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种工作，我们将尽量予以指导并提供所需要的调查表格。工作正待展开。不幸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后，战争的威胁日益扩大，直到广州沦陷后，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后来我到北京才知道当时辅仁大学有位教授叫贺登菴（W.A. Grootaers）的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语言地理学的论文，对我这一计划十分欣赏，但多年来没有看见我将所得结果撰文发表，非常悬念。我听了无限愧怍，深悔没有把事情做好。

广州失守后，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把学校辗转迁移到云南徵江县。稍事安顿后就想以西南联合大学为榜样在附近、少数民族地区做些小规模的研究工作。想不到事情刚刚理出个头绪，忽又奉令把学校再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我因特殊关系不能在贵州境内崎岖地带随校长时间忍受颠簸，只好遵医嘱乘火车到越南西贡堤岸知用中学友人处暂住，等到学校新校址布置妥当才打电报要我回去。一家大小决定乘轮经香港绕道广州湾转入内地。刚到香港，当地巡警上船检查行李，把我的几包未及整理的调查原稿当作犯禁的秘件强行没收，不容分说，我也只好徒呼嗷嗷了。

回到坪石，我又重温故业，恢复我的粉笔生涯，间或写些零碎的稿件，投寄重庆和昆明各地的报章杂志发表。适值